

Chen cheng xiong

陈澄雄



竭尽全力 忠于职守 ——我的音乐生涯自述

陈澄雄

这是我个人的自述，不敢自诩为“自传”，内容仅以个人平素音乐生涯，作一个扼要的剖陈，藉供海峡两岸及海内外知音有缘雅聚，细观谛聆我指挥的音乐会时，便于惠赐见教，作为一个印照参酌而已。

我家先祖原为福建充满宋明人文遗风的泉、彰二州之一的彰州。随着明清改朝换代的战乱，飘过海峡，到台湾开垦，定居于本岛东北一角依山面海的广阔平原宜兰头城。世代祖德留芳，一直都是耕读传家。1941年，我出生在一幢四周都是水稻秧田的闽南式红砖三合院的老屋内。幼儿时期，相伴的只是白天远山含黛，白鹭飞翔，

晚间则有清风明月，蛙鼓萤灯。稍长正式入学，恰好是抗战结束台湾光复第四年接受完整的小学教育。今天大陆所谓的“民国风”，台湾地区七十年来从未间断，尤其是崇文尚艺的学风，身为启蒙学子，今日思之深感受惠匪浅。

七岁至十二岁童少时期，除正常课业之外，在大自然的山声海韵孕育之下，性向逐渐趋向音乐。对于年节庙会号角喧天、锣鼓动地的民俗庆典活动（其中包含有歌仔戏、京班、南北管以及台湾少数民族的歌舞等）极喜欢凑热闹，而且挤到人前，注目细听，乐不思家，甚为自得。同时在校的音乐课上，老师教我们唱了许多李叔同、黄自、刘雪庵的歌曲，也初识了贝多芬、莫扎特、舒伯特等西方音乐家，习唱着他们由中国诗词名家改填中文歌词的曲调，深深着迷。个人兴之所至，更喜欢自我摸索，自学笛子、口琴、吉他、手风琴，兴味盎然。并曾获选受邀远赴台北“中国广播公司”，在白茜如姊姊主持的儿童节目中表演笛子演奏。在广播的黄金年代，给了我很高的荣誉感，当然也是最大的鼓励。

十二岁到十五岁进入初中读书的少年时期，课暇开始正式拜师学习钢琴、基础乐理。并参加周末社团的管乐队，常常参与许多合奏活动。如上所言，彼时正值广播媒介的鼎盛时代。有幸家住宜兰，台湾戒严时期收音频道管制极严，但对乡间来说鞭长莫及，收音机倒是家家都有，而且远离市嚣。课后回家，每当更深人静，常常放

胆“偷听”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，对于“民乐”与“京剧”最为着迷，这也是我与“国乐”和“京剧”结不解之缘的肇始吧！

从十六岁到二十一岁，青少年时期考进台湾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科进德修业五年，主修理论作曲，并加钢琴、长笛。有幸成为誉满全国的和声、对位权威大师萧而化教授的门生。萧先生是继李叔同、丰子恺等留日派嫡传诗、文、画、乐四艺俱臻的大师，曾执教过南京“中央大学”音乐系、福建音专。1949年来台，任教台湾师范学院、艺专、政工干校等音乐科系。他是一位极富书卷气的慈蔼长者，教学严格细密，指导和批阅我们的习题作业，心细如发，不容丝毫差错。每个音符稍有不妥，都逃不过他的“鹰眼”。红笔打叉，并叫作题的人当堂弹出声音，再加改正，命大家用双耳感知它的差别。这对我矢志于音乐艺术的一生，影响至深且巨，因为这正是我扎根奠基的钻石年华啊！

在五年制的台湾艺专学成毕业之后，很幸运能够学以致用，经过考试遴选成为台湾“省立”交响乐团团员，担任首席长笛。这是在交响乐团里正式历练的初阶，也是对于指挥与演奏家互动关注的开始。除此之外，还在演奏之余，兼任学校的教席。在教、学、做三者循环相长之中，恪尽自己的职守。经过四年无数次演奏以及会同侪及指挥互动等机缘，深入了解了管弦及打击各类乐器的音色与韵味、编配在总谱上的排列组合，并与过去所学一一印证等。如是

一番宝贵的经历，影响我赴欧深造，意义深远。

1965年首次出国，只身负笈天涯，牢记恩师的叮咛和鼓励，远赴奥地利萨尔茨堡莫扎特音乐学院主修指挥法，兼习长笛、双簧管、钢琴。只身在外想起父母养育之恩，长大成人了，还要省吃俭用为我筹措学费，加上许多师友们的祝福期盼，真的焚膏继晷，不敢有丝毫懈怠。幸好求学的环境甚佳，除了功课上的进德修业之外，阿尔卑斯山的雪峰翠谷，草绿花红，城乡小镇巴洛克式色彩明丽、高低参差的墙屋小巧窗台上，布满了鲜花，人群相遇彬彬有礼，假日广场乐声悠扬……条顿（日耳曼）民族文化特有的理性、浪漫、细密精致、深邃幽雅，也深深陪伴熏染了我三年多漫长的求学生活。

1968年学成归国，开始正式“误人子弟”。母校艺专与“中国文化学院”都聘我担任教席，奉献所学，薪传学子，做起“望之俨然”的先生来。这段时间，除了教学之外，个人也曾举办过长笛、钢琴等独奏会，以及参与音乐会伴奏等。除了指挥、配器等合奏课程之外，个人“玩”乐器的机会也不少。当时恰逢台湾地区经济起飞，文化复兴列为建设之首，我个人只是生而逢辰的幸运儿，紧跟时代脉动，身在福中更加努力惜福而已。果然，不久又承命负责培训全省各大专院校及高中青年的管乐合奏，并在短期间组成“自强”“幼狮”先后两个管乐队，于1976年及1980年分别带队赴美，参加美国和平公园露天演奏的国际大赛，先后夺冠，均获最高的3A首奖。

这段时间也是我积累经验非常重要的关键岁月。

1984年,也是在机缘巧合下(不及赘述),突然承命接掌台北“市立”国乐团,内心诚惶诚恐。音乐虽然不分国界,但却有鲜明的国籍,它是一个地域历史文化滋育衍生的心灵瑰宝,在美学上的核心价值,就是最珍贵的“民族性”。因此,我以忐忑不安的心接下“台北市国”的重任,在做中潜学,在学中努力去做。思维常常沉浸在二十世纪初期,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以来现代国乐发展的历史脉络中摸索探究。深深景仰蔡元培、萧友梅、刘天华、吴伯超等先贤为了振兴中国音乐高瞻远瞩,超越了清末儒家中、西体用二分的论述,创新“古为今用”“洋为中用”的理念,心中颇有启我茅塞的欣悦,心神稍安。再多方向台湾地区国乐界先进、师友请教交流,开始了我在国乐乐坛的历练。

在“台北市国”担任团长兼指挥七年期间,我首先推用五线谱,不再使用法国神父发明的阿拉伯数字的简谱,因为国乐乐器必须要以“定性音”才能合奏,后者只能用于“弹性音”或自由加花的齐奏。国乐既然要交响化,就必须从彩虹般并行的齐奏,转化成织锦般交叠的合奏。何况先贤们早已将拉弦乐器的把位,先后不断作过多次调整,再加上作曲家、演奏家、指挥家的心血交汇,“弹性音”在合奏中并不会消失,像《梁祝》,甚至中西乐器皆宜就是典范。也唯有如此,国乐才能面对地球村时代独领风骚,不让西乐专美于前。

其次是改变训练方式。先从巴洛克式的室内乐方式细磨，再到整体密合，追求最高的演奏水平。为了国乐的薪火传承，我也每年暑假设立中小学“教师国乐研习营”。另外又成立一个“附设台北市青少年国乐团”培养国乐新生代的接班人。

为了学术研究、活动信息的传播，以及海峡两岸和海内外有关国乐乐坛的互动与信息的流通，我们出版了纸本媒体《北市国乐》月刊（现改名《丝路》），并举办国乐作曲比赛，以及征求约请创作国乐新的作品，用以确保音乐会的曲源与知音人口的增益。

传统戏曲的串演用交响乐形式伴奏取代文武场托腔，司鼓也由指挥取代，在大陆早已司空见惯，在台湾地区则是由我带领“台北市立国乐团”全体同仁全力以赴，为京剧与台闽最重要的地方戏“歌仔戏”伴奏，开了风气之先。

至于音乐会的演出，则不论器乐、声乐形式大小，举凡新作品推介，纪念庆典性演出，音乐家交流专场，民众生活礼仪（婚丧喜庆）音乐的实验与推广，民歌、艺术歌曲之独唱、合唱，台湾少数民族歌舞等品类繁多，不及细表。而其中最值得告慰台北市民纳税人的是，我与我们的市国团队，创立了一个“台北市传统艺术季”，广邀音乐、戏曲、说唱的个人与团队菁英共襄盛举，年年不断一直延续至今。

七年多来作为一个团长兼指挥，穿梭于办公室、排练场、音乐

厅、案牍劳形于批呈公文、校定曲谱之间，常常废寝忘食，未敢稍息，甚至舟车奔波道上仍然手不释谱，“以视作听”也未稍歇。从工作繁重的经验中，也有了一些宝贵的憬悟：一个乐团经营运作的顺逆或成败，关键在于行政与专业之间互动的良窳。专业演出最大的依靠在行政，行政所有聚焦在专业。个人才疏学浅，不谙“领导学”，幸而“指挥法”中的基础理论先要求自己 and 演奏家各安其分做好自己，再各尽所能完成默契。原来指挥的学问，本来就有领导学的基因。

由于当局与地方很多主管文化的长官们，抓住了我农家子弟出身天性吃苦耐劳的“小辫子”，1991年又奉调到台中雾峰的台湾“省立”交响乐团，等于重回娘家，仍与“北市国”一样身兼行政与专业，得失成败一人承担。为了感念知遇，正如胡适之的名言：“做了过河卒子，只有勇敢向前。”就这样，十二年的壮年岁月，都作了拼命三郎奉献给“省交”。回顾这段时间，我十二万分感念同仁们对我的信任与合作，尤其是包容。大家苦乐参半，劳逸难分，共同以心血热汗拼搏耕耘，历遍台湾地区城乡及外岛，在新旧世纪交替、雅俗共赏的新时代已经开始的时刻吹响序奏的号角。除了举办无数次西洋古典名曲以及歌剧的殿堂音乐会之外，并用卡车改装成表演台在小镇的庙口广场、乡间晒谷场上举办庙会式或星光音乐会。台湾城乡教育普及不愁没有知音，因此我们也乐此不疲。

新世纪的音乐艺术除了是雅俗共赏的新时代之外，也是民族音

乐的盛世。因为西洋音乐四百年来发展到了国民乐派就被先后第一、二次世界大战摧残断代，残垣断壁上蹦出来的现代乐派只有五十年的昙花，民族音乐才是音乐艺术复苏的春信，恰好我在“台北市国”做过国乐交响化的文化工程，心中难以忘情。在“省交”我则颠倒过来，努力交响国乐化。首先我每年要举办一次两岸作曲家研讨会，以及作曲与器乐演奏比赛，也将“北市国”的经验再现，创办了一份纸本媒体《省交乐讯》（现改名《乐览》），成立台湾省青少年交响乐团。由于当年在“台北市国”的宝贵经历，使我对于两岸音乐互动的了解获益良多。因此，引进了不少大陆地区的歌剧作品在台湾演出，计有《第一百个新娘》《原野》《西施》及歌舞剧《走西口》、芭蕾舞剧《敦煌梦》还有各省的民歌等等。台湾知音十分喜欢，因为这些都是有血缘文化的音乐作品。至于率团或个人到海内外交流访问每有音乐会，必定力邀两岸知名音乐家以特聘客席身份参与演出。因为十九年来次数太多就不细述了。

2003年，我卸下了“省交”团长兼指挥这个音乐公务员职务正式退休。“挥一挥衣袖”仍然挥不去与同仁甘苦相共的片片云彩。此后一直至今，就过着自由指挥或客席指挥的音乐吉卜赛人的生涯。作为一个学兼中西的指挥（不敢自诩为“家”），是我个人人生际遇上的幸运，一切成就（如果也算的话）都是恩师栽培、贵人提携、同仁劳怨不辞的合作、知音的掌声与众多师友的鼓励所赐予，在此

衷心感念，终生不忘。

在音乐会上，指挥是作曲家（在座或在天）、演奏家与台前爱乐知音共同注目倾耳的聚焦对象，荣誉与压力相等，不得丝毫轻忽。基于此一浅识，我对排练的态度绝对严格，要求演奏家们绝对不容分心闪神，必须全神贯注，自奏与合奏必须尽心尽力，分毫不差。正式上台面对观众，我则细心掌握，用眼神或手势请求演奏家的浪漫挥洒，务使每一首作品都能演奏得酣畅淋漓。因为这样，所以在排练场所与音乐殿堂之间常被合作过的演奏家们用“魔鬼与天使”来戏称。前者我不便置评，后者则是过誉。大家灵犀相通合作圆满，庶几不负众望才是重心。我个人不过是面对音乐艺术竭尽全力忠于我自己的职守。曾经的与将要合作的伙伴们，在此告罪了。